

从轮船招商局看岭南商人的历史贡献

□ 戴鞍钢



上海外滩万国建筑 轮船招商局 视觉中国供图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绵延千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，就会发现：海洋不仅连通世界、激荡文明，也深刻塑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轨迹。

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，地处东海之滨、面向太平洋；岭南文化滋养的珠江三角洲，濒临南海、商贸兴盛。两大区域皆因海而生、依海而兴。近代上海开埠通商，使江南与岭南在同一时代舞台上相互激荡、彼此汇流；而以欧美近代商业文明为背景的“西学东渐”，更为这种地域文化与贸易网络的互动，提供了新的动力。
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，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诞生并发展壮大，其中，来自广东的商人与航运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成立与经营，成为近代中国文明交流与航运贸易转型的重要历史见证。

传统漕运危机与江南商界的“知识时差”

植根于江南文化沃土之上，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因子。唐宋时期，上海地区就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、青龙港和青龙镇。近年来广受瞩目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（被列为“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），出土了大量文物，确证了其作为唐宋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。至清代中叶，黄浦江边的十六铺港埠和上海县城，已有“江海之通津、东南之都会”的美誉。

近代以后，伴随着“西学东渐”的浪潮，西方的坚船利炮与近代轮船进入中国海域。相比于传统的木帆船，西方轮船在速度与载重量上的优势是绝对的。清代有所谓“三大政”，即漕运、盐政与河工，其中维系王朝经济命脉的南粮北运（漕运）体系，长期依赖江南水系特有的平底沙船承担运输。但在外洋轮船的冲击下，传统的沙船业遭遇严峻挑战。

1871年，直隶发生严重水灾，京城迫切需求，但当时的传统沙船业已趋凋敝，无力承运漕粮北上。严酷的现实迫使晚清政府与商界必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。上海的沙船商人在筹备自办轮船企业以应对外资航运压力的过程中，获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批准与支持。1872年12月23日，李鸿章奏准清廷设立轮船招商局，并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。其初衷非常

明确——“挽回利权”，以确保漕运和沿海贸易的命脉不完全假手于外商。

招商局初创时，负责筹备的是出身于江苏宝山沙船世家、时任浙江海运局总办、候补知府的朱其昂。朱其昂等人虽然精通传统沙船业务，但在面对西方近代企业的股份制作、资本筹集以及国际航运规则时，却显得力不从心，暴露出当时江南商界在应对现代商业制度时的“知识时差”。尽管他“习知洋船蹊径”，但在上海商界人脉不广、号召力有限。

一场“及时雨”：岭南商人的入局与制度移植

在这一关键时刻，大批随着五口通商向北推进的广东商人，成为了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一场“及时雨”。1873年5月，李鸿章果断聘请在沪的粤商唐廷枢、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，由唐廷枢任总办，徐润、朱其昂、盛宣怀等为会办。

岭南地区在对世界的交往，特别是与欧美国家衔接的广度与深度上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。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历史进程中，岭南商人最早接触并吸收了西方的商业规则与企业制度，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经营本领。

唐廷枢和徐润的家乡，正是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，更是当时广东“风气最开通的地方”。他俩很早就浸透搏击中外贸易商场，已积累的经验、知识、技能、眼界和人脉，远非国门初开的上海沙船商人等所能比肩。

以唐廷枢为例，他早年曾在香港的教会学堂求学。还在鸦片战争前，为了中外贸易的需要，华南沿海已流行着所谓“广东英语”；正是为了适应广东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实际需要，他在1862年（30岁时）精心编撰出版了《英语集全》。这不仅是一部面向商贸往来的实用英语读本，也是一部系统介绍西式商业与社会知识的英语教材，共分天文地理、日常生活、工商业、国防、买办问答等六卷，并用粤语注音。这种跨语言的微观交流工具，是中外贸易文明交融的生动画像。在加入招商局之前，唐廷枢还与英商合资开办东海轮船公司，在首批入股的1650股中，华商股份占935股，其中唐廷枢一人就有400股。他还曾出任该轮船公司的襄理。另一位香山人徐润，同样具有广阔的

国际视野。他的叔父徐荣村，早在1851年便率先将中国湖丝运往伦敦，于首届世界博览会上参展，让中国物产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。徐润本人“年十五来沪上，弃书习贾，业丝茶二十年，中外人士交相推重”，他不仅曾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股东，在受命加入招商局后，更是毅然“即将向做茶叶等生意概行停止，以专局务而免分心”，为招股、揽载煞费心力。

唐廷枢、徐润等岭南商人的加入，为招商局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商界人脉与近代资本运作经验。对于这项人事变动，上海报界给予了高度评价，1873年6月9日的《申报》以《轮船总办有人》为题称赞：“轮船招商局向系朱君云甫办理，李节相已改委唐景星（注：唐廷枢字景星）总办矣。按，唐君阅历外务，洞悉西船运法，以此任属之，真可谓知人善任者也，想轮船公事从此日起色，其利益岂浅鲜哉？”

“粤人经商，苏人理漕”：大航运贸易网络的崛起

随着唐廷枢、徐润等人的全面操盘，招商局形成了近代企业史上极其经典的一幕——“粤人经商，苏人理漕”。

这是一个两种地域文化巧妙衔接、互补共进的生动案例。由更熟悉国际规则、拥有广泛人脉的岭南商人，负责招股、揽载等全盘商业运作；由熟悉传统官府运作和漕运体系的江南士商，负责处理官务和漕运。

这种合作，从根本上体现了近代江南商人务实而开放的心态——一旦认识到自身在“西学”和近代经营上的短板，便豁达地让更能干的岭南商人来挂帅。同时，这也展现了岭南商人极高的制度移植与资本号召力。在唐、徐二人的苦心经营下，大量资本涌入招商局，当年（1873年）《申报》便惊呼：“查此局近殊盛况，大异初创之时，上海银主多欲入股份者，时人亦有云：‘昔年招商局朱其昂始创，只有轮船四艘，为运漕而已。后唐廷枢、徐润接办，推广航路，招集商人入股，粤人十居其七。’1881年，招商局顺利招足了额定资本100万两。1879年底，唐廷枢在致函盛宣怀时无比自豪地回顾：‘接办之时，商股全无，至今股份将及百万，每股百两，计七年已分回利息七千两。’更为壮阔的是，在江南与岭南商人

的携手并进下，中国近代的大航运贸易网络被大大激活。他们突破了外资轮船公司的压制和阻挠，不仅将沿海干线以上海为中心，迅速向北延伸至烟台、天津、牛庄，向南拓展至福州、厦门、汕头、广州及香港，几乎贯穿中国绵长的海岸线；更将航运网络深入汉口、宜昌等长江内河体系。这种“沿海干线+内河网络”的布局至关重要，它极大地增强了沿海经济对广袤内地的辐射力。

在此基础上，招商局的航线更是延伸至日本长崎、神户，以及南洋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地。这一创举，极大地撼动了外商的航运垄断。总理衙门章京顾肇新曾评述招商局的崛起：“与太古、怡和鼎峙而三，使其利不尽为外人所攫夺，所谓收回利权者，用意实在于此。”英国人在沪办的《北华捷报》则抱怨：“成立轮船招商局原则上是为了中国人，为了尽可能将沿海的商贸发展控制在国人的手中，只是这个公司过于实现后面的部分了。”

两地商人的精诚合作，真正实现了“挽回利权”的初衷，也为日后中国丰富的本土物产（包括“广货”）走向世界，提供了不受制于外商的近代化物流与资本保障。

历史的回响：交融互鉴的时代启示

近代中国人办企业者众多，但像轮船招商局这样历经风雨、经营成功的屈指可数。其中，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

互鉴，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今天，当我们漫步上海著名的外滩万国建筑群，在那些曾经外商林立的中心地段，依然屹立着一栋巍峨的百年建筑——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大楼。早在1877年，苏州士人潘钟端造访此楼时，便在日记中留下了极其生动的现场感：“屋凡三层，就两层之楼已极宽敞，几席齐排。临窗一观，正对黄浦，下接码头，一切安便。”

这栋屹立百年的大楼，宛如一种历史的象征。它见证了在千年贸易的文明交流中，中国商人如何以务实、包容的心态，携手迎接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；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吸收“西学东渐”的先进企业制度，在洋商占绝对优势的竞争中，硬生生拼下了一个立足之地。

追溯源头，上海开埠后得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之机，沪粤两地的有识之士功不可没。回顾这段由海洋孕育、在激荡中前行的中外贸易史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深刻视角，更为今天跨区域的经济协同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参照。挖掘和利用江南与岭南文化中开放、务实、创新的历史底蕴，必将为今天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“广货行天下”的远洋航程，提供深厚的历史启示。

（本文作者戴鞍钢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25年11月28日，作者曾在由上海市社联、广东省社科联、广州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“江南文化·岭南文化”对话中，作“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——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”相关演讲。）

2026年3月20日

星期五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陈日升

校对 林霄

编者按

当时代加速，必有浪潮涌动，亦有指针流转。“西学东渐”激荡在近代的海滨线上，既是文明的破壁，更有关乎生存与尊严的百年图强。

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，复旦大学戴鞍钢先生带领我们重返黄浦江畔。轮船招商局的汽笛声中，岭南商人以务实与胆识入局其间，撬动旧秩序的桎梏；江南儒雅与岭南血性交汇，拓开向海而兴的新格局。

广东省博物馆吴昌穗先生，则在广钟的方寸天地里，照见另一种静谧的角力。大航海时代的雄心被拆解成齿轮，在中国工匠指尖重组。所谓丈量时间，也是定义自我，完成从模仿到自主的觉醒。

破浪而行的巨轮，与分毫不差的刻度，看似各在一端，却同为时代剧变留下的锚点。它们提示我们：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覆盖，而是在往复间彼此塑造。世界的尺度由此被重新理解，本土的筋骨，亦磨砺出愈加挺拔的轮廓。其间所积，渐次汇成磅礴。

专题策划：温建敏
专题执行：潘玮倩



铜镀金转人亭式钟 故宫博物院供图

铜镀金嵌珐琅球花亭式卷帘白猴献寿钟 故宫博物院供图

滴答作响的西学东渐：清代广钟里的贸易繁华

□ 吴昌穗

毫毕现，更像时光的封印，抵御了岁月侵蚀，令器物历经百年依然明艳如初。

广钟竭尽所能的原创性发展，充分显示出“中国智造”的早期萌芽与持久魅力。

超级链接者：大航海时代的“广州时间”

技术的流转，往往伴随着资本的踉跄与贸易的扩张。

中国探索机械计时仪器的时间早，技术迭代相对较慢，广钟的出现依赖于外国技术和商品的输入。最早将西洋时钟带到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。明万历九年（1581）春，他从澳门来到广州，将一块机械表送给总兵黄应甲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底，罗明坚、巴范济在广东肇庆向两广总督陈瑞献上自鸣钟等贵重礼物。陈氏非常喜爱这些新奇的洋玩意。

文明初遇需交通。罗明坚当时还亲自调试自鸣钟，按中国习惯把欧洲一日24小时改为一日12个时辰，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。此举赢得了中国官员好感，为传教事业提供极大方便。西洋钟传入不仅是中国计时系统的变革，更是中西交流的“敲门砖”。

一“砖”叩门。而政策的倾斜，则彻底激活了广州的制造底盘——
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皇帝发布上谕：“嗣后口岸定于广东，不得再赴浙省。”清政府“一口通商”的决定，让广州垄断中西贸易长达85年。此后，英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船只仅被允许在广州贸易，广州因此成为中外贸易的“超级链接者”。

中外货物云集，巨大的市场红利为广州手工业插上翅膀。

明清时期，广东手工业和商业已十分发达，形成了广州、佛山和潮州三个手工业中心。广州地处东江、北江、西江交汇处，是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，也是岭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手工业城市。这为广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：一方面，熟练的工匠为产业提供支撑；另一方面，各类零部件和原材料易于获取，为组织生产提供了便利。

跨越重洋的“接力”：齿轮咬合处的中西文明互鉴

文明的交流，不仅有货物的吞吐，更有跨越重洋的匠人接力。

在西洋时钟传入早期，广州工匠就开始参与生产。罗明坚到达肇庆的次年（1583），利玛窦专门从印度果阿带来一名造钟匠在肇庆生产时钟。广东官员调集两名技艺高超的匠人协助，开启了西方时钟制造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先河。

随着航线变得热络，技术的在地化转移加速。清代前期，西方商人从伦敦运来机械设备，并派遣熟练工匠在广州建立作坊。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马金图斯在广州开设了钟表工厂；另一个工场为18世纪伦敦著名钟表匠詹姆斯·考克斯的后人所开；马夏尔尼使团的瑞士籍钟表匠也留在澳门，并有广州工作。

风云际会处，更有审美的交融。西方匠师带来大量域外文明元素：古希腊、古罗马风格圆柱（含爱奥尼亚式涡卷和科林斯式草叶纹饰），拜占庭风格的穹隆顶和马赛克壁画，以及哥特式、巴洛克、洛可可等建筑风格，皆大量运用在广钟装饰上。

在这场交汇中，中国工艺技术也得到补充与完善，尤以珐琅工艺为甚。早在13世纪末，阿拉伯珐琅便传入中国，形成明代盛极一时的“景泰蓝”工艺及作品，但广钟使用的透明珐琅却另有渊源。

据故宫研究员郭福祥考证，透明珐琅是“将透明釉料施于金属胎体之上，经烧制后形成一种透明釉底，明暗变幻的珐琅艺术作品。最早出现于13世纪意大利锡耶纳……在中国这种珐琅一直没有引起关注，直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实践，是各类珐琅中最晚传播到中国的品种”。

面对这项西洋绝技，清代广州工匠迅速将其本土化。从存世的广钟可见，工匠们自主研发出硬透明珐琅，将其广泛点缀于表盘四周。泛着蓝、绿、黄、紫、红、白等色彩的珐琅釉层，不仅让底部的铜鑿花纹理纤

先因后创：从器物模仿走向“中国智造”

真正的吸纳，是在模仿后的重塑。

西洋机械时钟和配件在广州上岸集散，加之广州工匠众多，广钟生产历经了模仿、消化、创新的经典“工业化”路径。制作初期，核心零部件依靠进口，造型功能学习英国钟等西洋时钟。但随着工匠的成长，广钟的自主性不断增加，广州工匠不仅能制作外壳，还学会制作表盘、机械报时及表演系统等核心零部件。

如此，当核心技术被掌握，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时间表达，也应运而生。在造型艺术上，广钟整体外形多采用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，或葫芦、花盆等吉祥物；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对内部机械自动人偶的改造。工匠利用多盘塔轮或发条带动齿轮系统，将西洋机械表演系统充分中国化，使其能定时展示“万寿无疆”“天官赐福”等条幅，以及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等对联。当时广钟的技术水平已接近同时期欧洲制钟水平。

材料的跨界同样是一大壮举。广钟不仅大量制造铜镀金时钟，还广泛使用紫檀、酸枝等珍贵木材。此外，“土玻璃”的运用藏藏生动的互鉴细节：据马夏尔尼使团成员吉兰记载，广东艺术家“确在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，然后将之春烂，置于熔炉再度熔化”制作器物。这些玻璃被精妙制成广钟内的水法柱，通过齿轮旋转表现水流升降的风景。

技艺的淬炼并非一蹴而就。起初，广钟的制作远不能令皇帝满意，乾隆曾特意下旨叮嘱：“务要实在洋做者方可。”然而，随着工艺不断完善，广钟质量日精，延至嘉庆时期，广东粤海关已“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”。这种从被要求“洋做”到凭实力岁岁进贡的反转，清晰勾勒出“先因后创”的演进线索。

机巧背后：一场擦肩而过的工业晨光

然而，发条虽紧，历史的车轮却在古老的帝国面前渐渐滞重。

广州工匠在消化欧洲钟表结构的基础上制作广钟。为保证计时准确，他们吸收西洋钟的“塔轮芝麻链”结构，“非常巧妙地规避了发条动力不均匀释放的弊端，确保了走时的准确”。广钟的机械装置，包括擒纵系统、表演系统等都是在西洋时钟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本土化的。每一座广钟都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例。

器物的吸收堪称完美，思想的壁垒却依然森严。在这场跨越重洋的交流中，广钟不仅是精致的器物，更像是一面折射历史局限的镜子。西洋自鸣钟虽打通了交流壁垒，但广钟并未引发清朝统治阶层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关注，中国社会仍沿着传统的道路缓慢发展，走向“过密化”。

当欧洲借计时仪器测算经纬，清廷沉醉于机巧。马夏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曾指出：“中国人虽然在特定几种手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，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，比起西欧国家，实在是处于极落后的地位。”

这何尝不是一声沉重的时代叹息。若明末清初的西方先进技术，能引起统治者充分重视，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或许也会发生巨大变化。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，文化必须互鉴。

历史的指针无法倒转，但昨日的得与失，依然在今天激起回响。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网络使得寰球“同此凉热”。广钟不仅是打开中西方交流大门的“钥匙”，更是中国“工匠精神”与“早期智造”的实物印证。在“广货行天下”的今天，重温这段滴答作响的贸易史，是璀璨时光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图谱。（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）

